

李贺南游疑证

党银平

在李贺游踪研究中，许多名家在各类年谱和著述里皆称李贺有南游之事。如朱自清之《李贺年谱》，钱仲联之《李贺年谱会笺》，王礼锡之《李长吉评传》，吴企明之《李贺》，傅经顺之《李贺传论》等均主此说。甚至有人言李贺南行之前尚有入蜀之举^①，岭南之游，湖湘滞居^②。但均因缺少可信的佐证而颇多疑点。李贺是否南游就很值得商榷。兹妄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。

首先，从南游的原因分析，各家都作出了种种推论。

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认为：“意贺入京之先，尝往依其十四兄，故得饱领江南风色也。”又云：“寻贺之不能忘楚，或为糊口之方，或为兄弟之好，然尚似有不止于此者。”钱仲联《李贺年谱会笺》也认为：“贺十四兄在和州，贺南行当由省兄之便。”^③朱、钱二人皆推论李贺之所以南游，乃为赴安徽和州探视并依傍其十四兄，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。从《李贺诗集》可知，李贺直接咏及其族兄的诗不外《奉和二兄罢使遣马归延州》、

《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》及《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》。提及弟弟的诗也仅《示弟》、《勉爱行送小季之庐山》和《题归梦》。仅从诗题中所云“奉和”、“诗寄”、“寄上”字样，可知李贺与其二兄、正字十二兄、十四兄仅仅是一般的堂兄弟的关系，李贺想必不会冒然远道投奔。且无相关资料记载其与十四兄互相往来的线索，如两《唐书》本传、《唐才子传》及义山《李贺小传》等原始材料，均未叙及此事。因而就不能似是而非

地遽定投靠十四兄之说。况且就《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》一诗而言，李贺也只泛泛地向十四兄倾诉了自己在潞州的境遇和心情。属于阎索琚谱中所说的那种较疏远的“族兄”关系。因为本诗有语云：“秋至昭关后，当知赵国寒。系书随短羽，写恨破长笺。”即表明诗人客游山西潞州，而其十四兄却远在和州昭关，两地悬望，恰遇江使，便借此机会委托其捎书以示问候。清姚文燮所说“兄客昭关，弟羁赵国，秋至，兄应念弟寒，写书寄恨，情意绵绵。”^④也正是此意。朱谱仅据本诗尾句所说“觉骑燕地马，梦载楚溪船。桂椒倾长席，鲈鲙斫玳筵。岂能忘旧路，江岛滞佳年”，来断定李贺似乎南行，就属于主观推测。因为就“觉骑”、“梦载”语看，诗人只是表达一种欲往游历的愿望，而并未成行。最后两句诗则完全是对其十四兄的奉劝语气，并非表明自己滞留江岛。况且，“楚地”在唐人诗中含义比较宽泛，并不专指两湖地区，多泛指广袤的南方，如李善注《文选》就引孟康注《汉书》语说：“旧名江陵为南楚，吴为东楚，彭城为西楚。”而朱自清所说“寻贺之不能忘楚”而去乡南游，便显得十分含糊。李诗《自昌谷到洛后门》之“始欲南去楚，又将西适秦”已表明了自己的选择，再与其到京后所作《始为奉礼郎忆昌谷山居》所云：“犬书曾去洛，鹤病悔游秦”相参读，更证明赴楚之探视十四兄之说难以立论。其缘由正如扬其群先生所云：“贺有十四兄在楚，思往依依，求其援引，然又恐楚地局于方隅，未必能以文显，故卒西行也”^⑤。所以，若简单把寻访十四兄作为李贺南游的原因，就略嫌牵强。

从南游的时间上看，各家也都有不同的臆测。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据“岂能忘旧路，江岛滞佳年”，便说“谓少时尝滞留江岛，至今难忘旧路耳”，由此得出诗人“入京之先”曾南游吴楚的推断，却未明言确切年限。钱仲联《年谱会笺》云：“本年（即元和二年丁亥）李贺十八岁似曾有东南之行。”傅经顺认为南游

应在元和元年(约806年),吴企明则认为当在元和十年(约815年),即从潞州归昌谷后再远涉吴楚。但若据李贺生平行状推算,南游的可能性却极小。因为从其具体行状看,德宗贞元六年(790年)到宪宗元和元年(806年),李贺主要在故乡昌谷生活和读书。元和元年(806年),据义山《小传》云“时(贺)鬓已斑白”,诗人所作《春归昌谷》也云:“终军未乘传,颜子鬓先老”,可见,李贺天生体弱多病,自然无余力远游他乡。又据《新唐书》卷三十六《五行志》记载,元和元年夏,“浙东大疫,死者大半”,诗人也绝不会在灾疫之年涉险南去。元和二年(807年),据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考知,韩愈本年改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,李贺时年18岁,至洛阳以歌诗拜谒韩愈,显然,李贺其时正宦游东都,不会南游。又据田北湖考定,本年贺父晋肃亡故,从情理上讲,李贺也不能远游。元和三年(808年)至元和四年(809年),据本年所作《开愁歌》及《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》十三首,可知李贺已在东都应河南府试,并于元和五年(810年)初由洛赴京应进士试,受挫后便于本年冬回到故乡昌谷。其诗《出城》、《咏怀》等多叙及此事。元和六年(811年)到元和八年(813年),李贺又经洛入长安任奉礼郎三年,元和八年春,诗人终因官卑多病而辞还故乡。其集中《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》所云“辞家三载公如此”和《示弟》“别弟三年后,还家一日余”,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又从《春归昌谷》、《昌谷诗》、《兰香神女庙》、《昌谷北园新笋四首》、《南园》、《昌谷读书示巴童》等诗可知,李贺归家后便因病家居,服药疗疾,如《昌谷读书示巴童》之“虫响灯光薄,宵寒药气浓”即是明证。换句话说,李贺在元和三年和元和八年这段时限内,是不太可能出行的。元和九年秋,李贺为生计北上晋南潞州(今山西长治),投奔初效潞幕的故友张彻,时张正仕于潞州长官郗士美。从《河阳歌》、《七月一日晓入太行山》、《长平箭头歌》、《高平县东私路》

知李贺是经洛阳、河阳、太行、长平等地入赵的。但居潞三年，一事无成，病痼日深。其《客游》说云“四时别家庙，三年去乡国”，正是咏叹三年客游潞州的具体时间。元和十一年(816年)，李贺因病不得不重返故乡昌谷，且旋即病故。这期间当然更不会南行。

从李贺生活和身体状况看，南游的可能性也极小。李贺自幼时便家道中落，生活比较窘困。从某些诗中可知，李贺有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，如戴的是“头上无幅巾”（《咏怀其二》），穿的是“麻衣黑肥冲北风”（《野歌》），“衣如飞鹑马如狗”（《开愁歌》），“葛衣破碎赵城秋”（《酒罢张大彻索赠诗》）；吃的有时不能果腹：“家门厚重意，望我饱饥腹”（《题归梦》），“饥寒平城下”（《平城下》），有时还要靠乞贷度日：“索米王门一半无”（《勉爱行其二》）；住的是：“宗人贷宅荒厥垣”（《仁和里杂叙皇甫湜》）。诗人的身体又因先天不足，羸弱多病，未老先衰，根本不适于远游。悲吟多病的句子在李贺集中很多，如“病骨伤幽素”（《伤心行》），“病骨犹能在，人间底事无”（《示弟》），“壮年抱疾恨，梦泣生白头”（《崇义里滞雨》）。如果一个人连衣、食、住都保证不了，那么就更谈不上“行”了。加之当时舟车限制，离家出游是非常困难的。

最后，从李贺歌词的内容看，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仅凭“集中咏南地风土者极多”，便断定李贺南行为实，且举出《追和柳浑》、《大堤曲》、《蜀国弦》、《湖中曲》、《江南弄》、《贝宫夫人》、《巫山高》等诗以为“踪迹皆在吴楚之间”，并且认为，“其中固有用乐府旧题者，然读其诗，若非曾经身历，当不能如彼之亲切眷念”^⑥，这显然是缺少依据而难以足信的推测。当然，就李贺部分篇目而言，有些确曾咏及南地风物，且覆盖面很广，如《走马引》、《大堤曲》写湖北襄阳；《帝子歌》、《湘妃》、《江楼曲》记江陵、洞庭；《还自会稽歌》、《月漉漉篇》、《追赋画江潭苑》言金陵、会稽；《七夕》、《苏小小

墓》叙钱塘、嘉兴；《追和柳浑》、《拂舞歌辞》咏吴兴；《黄家洞》涉及岭南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人作诗往往“不讳摹拟”，多喜欢沿用汉魏六朝诗题和本事，故唐诗中同题并咏，沿用旧事的现象十分普遍。如《湘妃》、《大堤曲》等乐府古题，自两汉六朝创制以来，仿作者如云。李贺在元和之际便与李益并称“二李”^⑦，乐府诗的功力自然很深。据统计，李贺所存241首诗篇中，古体乐府就有160首以上，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，诗题多以“歌”、“引”、“吟”、“行”、“谣”等命名。不但沿袭原题，还多追叙旧事。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就收录了李贺的57首仿古乐府，如《巫山高》属汉歌之鼓吹曲辞，《江南弄》、《神弦曲》属清商曲辞，《江南曲》、《蜀国弦》、《塘上行》属相和歌辞，《拂舞歌辞》、《公莫舞歌》属舞曲歌辞，《李夫人歌》、《苏小小墓》属杂歌谣辞，《湖中曲》、《黄头郎》、《月漉漉篇》属乐府杂题，《湘妃》属琴曲歌辞。显然，在编次体例上，郭氏便直接将李贺此类诗纳入了古体乐府的范畴。后清王琦在集注李贺《蜀国弦》时也说：“《蜀道难》备言铜梁、玉垒之险，又有《蜀国弦》，与此颇同。”^⑧又引《乐府广题》注《苏小小墓》曰“古乐府有《苏小小歌》”^⑨，明确将之视为仿旧之作。故李贺绝大部分乐府诗沿用了六朝旧题，又吸收了《楚辞》奇幻的想象手法，多“追叙前事”，对此类诗就要客观分析，不能作为李贺南游的傍证。如《苏小小墓》写的是齐梁故事，诗句纯出自于南朝《苏小小歌》，而《巫山高》、《神弦曲》、《帝子歌》、《湘妃》则师法了《九歌》的手法。又如《还自会稽歌》一诗，虽描写了会稽风物，却不断言是亲历之作。因原诗下有自序云：“庾肩吾于梁时，尝作宫体谣引，以应和皇子。及国势沦败，肩吾先潜难会稽，后始还家。仆意其必有遗文，今无得焉，故作‘还自会稽歌’，以补其悲。”^⑩杜牧在该诗序中也称李贺是是在“补梁庾肩吾体谣”，属于“探寻前事”。

也就是说，李贺并未到过当时的会稽，只是以想象手法补充庾肩吾未尽的感慨，因而不可据此作为李贺游历浙江的实据。再如《黄家洞》一诗，虽写岭南容、邕二州官军与西原蛮的战事，却不能确认李贺曾实游岭南。因据《通鉴》及《新唐书》载，中唐时西原蛮作乱仅三次，第一次为贞元十年，李贺年仅五岁，尚在故乡昌谷；第二次为元和二、三年之际，时李贺正往来于京洛间，不会南游；最后一次是在元和十一年，据两《唐书》记载，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本年平乱因轻敌而失败，为邀功便“妄奏斩获二万”，李贺此诗当反映此次战事。但本年李贺刚从潞州游归故里，不久即病故，自然不会在岭南。

由此可见，李贺这类被杜牧称为“探寻前事”（《李长吉歌诗序》）的诗作往往并非纪实之作，因而也就不能简单地加以指实。比如说，大诗人李白一生并未亲游蜀道、剑阁，却借用“相和歌·瑟调曲”之一的《蜀道难》把艰险的蜀道写得如临其境。王昌龄本人也并未真正远涉边塞，却生动细腻地铺写了青海一带的军旅战事。同样，对李贺这类诗作也要客观分析，似乎不能简单地一一指实，主观上作出李贺南游的推论。

综合以上四方面的分析，笔者以为李贺南行之说并不可信。

注：

- ① 见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82年第三期邱实《李贺行踪小议》一文。
- ② 见刘衍《李贺评传》。
- ③ 钱仲联《李贺年谱会笺》，见钱氏《梦苕庵专著二种》。
- ④ 引《三家评注李长吉诗》，中华书局1950年版。
- ⑤ 引杨其群《李贺研究论集》，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。
- ⑥ 参见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。
- ⑦ 见《谈荟》，引自《李贺诗歌集注》。
- ⑧⑨ 见王琦《李贺诗集注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。
- ⑩ 叶葱奇《李贺诗集》1959年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